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建交及关系演变 (1949~1970年)

[埃塞俄比亚] 凯提马·达迪 张永蓬

内容提要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同后者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交同中国与其他多数非洲国家建交的背景有所不同,由于埃塞没有遭受殖民的历史,也由于该国于冷战时期在政治上一直靠近西方,以及双方面临的国内外因素,直至1970年11月,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外交关系,其间经历了20多年时间。双方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两国建交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 埃塞俄比亚 建交 周恩来 海尔·塞拉西

作者简介 凯提马·达迪 (Ketema Tesfaye Dadi), 埃塞俄比亚人, 获埃塞的斯亚贝巴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 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生 (长春 130024); 张永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7)。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下称“埃塞”) 建立外交关系已近半个世纪, 其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埃塞的关系经历了时间和重大事件的考验。中国与埃塞建交同中国与其他多数非洲国家建交的背景有所不同, 由于埃塞没有遭受殖民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意大利侵略), 也由于埃塞在冷战时期在政治上受制于西方大国的影响,¹ 以及双方面临的国内外因素, 直至1970年11月, 中国与埃塞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经历了20多年时间。本文旨在探讨影响中国与埃塞建交的国内、国际因素, 并对两国建交前的政治关系作出分析。

接触与停滞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进一步调整的重要时期, 这期间中国和埃塞的外交政策都受到美苏冷战的巨大影响。埃塞与美国关系密切, 而中国则实行同苏联友好的外交政策。当时, 中国外交

政策的重要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得国际承认, 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交往中, 朝鲜战争成为体现中国和埃塞两国持不同立场的第一起事件。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插手干预, 而此时美国已与埃塞缔结友好关系, 埃塞以联合国缔约国的名义向朝鲜派遣了军队。中国则以支持朝鲜人民军力量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帝国主义时代, 埃塞外交政策的原则之一是集体安全, 这就要求埃塞在国际及区域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根据这一原则, 海尔·塞拉西皇帝首次向朝鲜派出了6000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④ 其结果是, 在中国参战支持以金日成为首的北部力量的同时, 埃塞则支持以李承晚为首的南部力量。埃塞的参战直接与中国利益发生冲突。尽管中国和埃塞都坚持和平共处及集体安全

¹ See Negussay Aye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Ethiopia”, in O. A. Iko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African State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pp. 57-59.

^④ Negussay Ayele, op. cit., pp. 57-58.

的原则,但观点、结盟集团,以及各自利益的差异导致双方立场迥异。埃塞通过执行联合国任务提高了国际地位,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被它们视为可靠的非洲盟友之一。这次行动拉近了埃塞与美国的关系,两国于1953年5月签署了为期25年的合作协定。¹这些协定的签署以美国利益为主导,与中国的反帝政策相对立。

中国与埃塞两国建立联系和建交的过程颇为曲折。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新中国尚难以集中精力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随着国内形势,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稳固,中国外交最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取得突破。^④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埃塞则由外交部组成代表团出席。大会采纳了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十项原则”的基础,集中表现为“万隆精神”。万隆会议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折,它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和埃塞能够讨论共同利益问题的首次机会,为两国加强相互理解奠定最初的基础。虽然此时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官方关系,但代表们已在诸如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和亚非团结等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万隆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建立了新的团结阵线,开辟了美苏阵营之外新的外交领域。通过主张和平共处和亚非团结,中国打开了连接非洲事务的“窗户”。1956年,中国派出第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非洲,埃塞成为到访国之一。这是两国民间的第一次往来。作为回访,埃塞剧团也在次年访问了中国。然而,民间文化交流并没有带来政府间的联系,中埃两国都没有制定针对对方的相应政策。中国在与其它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得到理解,而埃塞对中国的看法则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政治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外交领域的延伸阻碍了埃塞对中国的承认。直到1958年,埃塞还和西方国家投票反对中国重返联合国。⁽⁴⁾可以说,埃塞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和埃塞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1958年后,埃塞外交出现独立自主倾向,对中国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埃塞至少在接纳中国作为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问

题上,与先前不同。在几乎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尚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情况下,埃塞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⁴埃塞政策的转变有多方面因素。在50年代后期,埃塞逐渐停止对特定集团的依赖,奉行不结盟多边外交政策成为当时外交的客观选择。塞拉西在其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曾指出:埃塞外交政策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阿克拉宣言》的原则为基础,倡导集体安全、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⁵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埃塞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行使权利。此外,地区形势也迫使埃塞寻求更多的朋友。50年代后期,埃塞国内承认索马里完全独立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埃塞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实现索马里的领土完整是大势所趋,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索马里人把欧加登地区视为索马里领土组成部分。⁶为遏制这种趋势,埃塞致力于扩大国际联系,包括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然而,这一阶段中国和埃塞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论战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对于埃塞在访问苏联期间签订的经济、文化等合作协议,以及苏联向埃塞提供4亿

¹ See The Ethiopian Herald, Addis Ababa, June 1, 1953; Jeffrey A. Lefebvre, "The United States, Ethiopia and the 1963 Somali-Soviet Arms Deal: Containment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Dilemma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6, No. 4, December 1998, pp. 615-616.

^④ See Gordon Cyrus Mwangi, "Bandung Conference: The Quest for a Moral Resolution to the Color Question", *Asian Studies of Australia and Pacific Conference Proceeding: Africa on a Global Stage*, Shi Koku Gakuin University, 2003, pp. 1-5.

⁽⁴⁾ See Negussay Ayele, op. cit., pp. 61-62.

⁴ See *Ibid.*, p. 62.

⁵ See His Imperial Majesty Haile Selassie, "Radio Message Broadcast from Guenet Leul Palace on August 28, 1959 and on September 18, 1959 by His Imperial Majesty Haile Selassie I", Addis Ababa, 1959. See also The Ethiopian Herald, Addis Ababa, November 1959, p. 21.

⁶ See Peter J. Schraeder, "From Irredentism to Secession: the Decline of Pan-Somali Nationalism", see http://www.press.umich.edu/pdf/0472098985_ch5.pdf, pp. 112-116; Hakan W. Berg,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6, No. 3, 1979, p. 190.

卢布的低息长期贷款等,¹ 中国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苏联对埃塞的影响显然有悖于中国的利益,至少在政治上如此。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和埃塞关系的发展速度。埃塞除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行使权利,并对其之前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表示认同之外,并没有就加强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努力。另一方面,埃塞与中国建立关系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随着埃塞与东方国家的接触,美国于1959年制定了针对埃塞及非洲之角的政策,基本方针是强化埃塞的西方倾向。在遏制中国方面,鉴于以埃塞为中心的非洲之角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美国反对中国与埃塞建交。1960年,索马里独立以来与埃塞发生的边境冲突导致非洲之角长期动荡,并引起外来势力干预。作为埃塞的亲密盟友,美国显然不愿看到中国在这个地区出现。美国政府曾宣称:“鉴于目前苏联在埃塞的活动加强,中国可能会利用埃塞与索马里争端,并优先考虑在索马里共和国进行活动(与苏联合作或竞争)”^④,因此,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借这一争端之机,同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建立关系。1960年刚果危机是影响中国与埃塞建交的另一因素或事例。当时在联合国的干预政策下,埃塞也派军队前往刚果,支持刚果政府,而中国却反对联合国干预刚果内政。^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埃塞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事实表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这些问题阻滞了两国官方关系的建立。可以说,东西方激烈的权力竞争和冲突是中国与埃塞之间长期未能建交的重要原因。

走向建交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和埃塞两国间有了进一步互动。当时的国内外客观现实对中国重建对非洲外交政策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国内方面,中国认识到自身国情特点和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国际方面,苏联开始强化外交政策,谋求缓和与美、中两国的关系。由此,中国认为只有通过积极支持的反帝、反殖运动,尤其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维护国家利益。随着许多非洲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中国开始在国际政治上积极影响非洲。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

洲十国,并提出中国对非洲国家政策的五项原则,为中国和埃塞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础。196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应埃塞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邀请,周恩来总理对埃塞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和埃塞走向建交的重要步骤。在双方联合公报中,塞拉西皇帝表达了埃塞政府的观点:“如果联合国要根据其宪章有效地执行它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世界机构中的合法权利就必须恢复。”中国和埃塞双方再次肯定万隆会议的意义,同意采取措施加强两国关系,包括使两国关系正常化。^⑥

埃塞之所以有兴趣和中国接近,与当时的地区和国际形势有关。其一是由于埃塞与索马里争端。埃塞和索马里对欧加登地区的争端使两国长期相互敌视,边境地区不断爆发武装冲突,直到1964年非统组织居中调停才得以停火。^⑦冲突期间,埃塞、索马里双方都在争取盟友,以得到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早于1960年同索马里建交,埃塞政府显然有意平衡或淡化中索关系。特别是在周恩来即将离开埃塞、启程前往访问索马里的历史时刻,埃塞也通过周恩来给索马里转达某种信息。其二是塞拉西皇帝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公报中,塞拉西强调了中国和埃塞两国的一个基本差别:“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而强盛的国家,埃塞则不是这样。”因此认为中国在“形成世界的发展方面有重大的作用可以发

¹ His Imperial Majesty Haile Selassie op. cit., pp. 18-19. See Country Studies “Sino-Soviet Relations”, <http://www.country-studies.com/china/sino-soviet-relations.html>

^④ Bil; Shinn, David H. “China’s Approach to East North and the Horn of Af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uly 21, 2005, p. 10.

^⑤ See T. R. Kanza “The Problem of the Congo”, *African Affairs*, Vol. 67, No. 266, January, 1968, p. 7.; Lawrence S.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Belgium, and the Congo Crisis of 1960”,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9, No. 2, April 1967, p. 11.

^⑥ 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载《我国领导人访问亚非十三国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页。

^⑦ See Saadia Touval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d African B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Winter 1967, pp. 102-104.

挥”¹。当然,对中国而言,周恩来总理对埃塞的访问,既有改善两国关系的需要,也在客观上让埃塞人放心,中国对索马里的访问是出于友谊和贸易,而不是要支持索马里针对埃塞的领土之争。

通过周恩来的访问,中国和埃塞两国坦率表明了共识,也没有回避分歧,为增进了解打下基础。首先,访问取得重要共识,两国的正式建交有了更加广泛和坚实的基础,双方都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在建立团结阵线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我们两国的制度不同,奉行的政策也不完全相同,但我们相聚在一起,目的是寻求共识,求同存异”^④。中国总理非常珍视埃塞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埃塞为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做出的努力,认为这次“会议是非洲团结的历史转折……正如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解放和亚非团结的历史转折一样”^⑤。基于这种理解,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次,双方都表明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的愿望。中国支持埃塞在非洲和世界和平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埃塞则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当然,这一时期埃塞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双方在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联合国等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

然而,由于受到国内、国际等多种因素制约,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埃塞两国前所未有的沟通与接触并未使双方建交,而是继续延后了数年时间。就埃塞而言,60年代后半期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盛行,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反对埃塞吞并厄立特里亚省的抗争不断高涨。埃塞无力控制事态发展的现实使人们更多将原因归咎于外部,开始怀疑中国对厄立特里亚提供支持。同时,中索两国良好关系使埃塞政府疑心重重,对中国的干涉政策深有怀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两国建交进程。对中国而言,6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思潮的波动干扰了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1970年11月24日,中国与埃塞正式建交,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力量的衰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第三世界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苏联

上升为与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现实深刻影响了中国与埃塞建交的外部环境:美国减少了对埃塞的控制和影响,美苏争霸引起包括埃塞在内非洲国家的普遍不满,反帝、反霸成为中国和埃塞的共同目标,而同属第三世界的现实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共同基础。根据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中国和埃塞政府根据两国的利益与愿望,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埃塞帝国政府遵照自己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所奉行的政策,并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则坚决支持埃塞帝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⑥这是对中国与埃塞建交条件的最好总结。

结 论

1949~1970年的中国与埃塞关系受到双方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两国建交的进程曲折漫长,反映了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特点,即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易受国际政治影响,因而缺少可持续性。但从总体上说,双方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和各自大陆的重要国家,中国和埃塞通过建交维护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广泛共识。从背景上看,两国建交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缩影,对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南南合作仍有启示意义。同时,作为历史经验的总结,1977~1982年两国关系的低谷与其前后阶段、特别是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反思。

(温耀峰* 译)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人民出版社编辑:前引书,第230页。

^④ Adie, “Chao En kai on Safari”, *The China Quarterly*, p 192; Nugussay Ayele, op. cit., p 62.

^⑤ Adie, op. cit. p. 193. Ethiopia hosted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which adopted a resolution to make Addis Ababa its sit.

^⑥ 参见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aw/jb/zzjg/lzs/gjlb/1460/1461/t6489.htm>, 2008年7月1日。

* 本文译者系天津职业大学基础课部讲师。